

马克思主义及哲学研究

马克思生产力论的生态维度 及其当代价值*

包庆德

【摘要】 相关文献表明,马克思具有生产力与资源环境和谐发展的重要思想。从马克思生态哲学维度审视,资源环境是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要素和重要条件,甚至是“第一源泉”;生态平衡是衡量生产力先进与否的客观“检验标准”之一;生态和谐有利于提升生产力达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双重和谐”。先进生产力应该而且必须遵循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文明、经济循环、社会和谐等科学发展的时代要求。

【关键词】 生产力 资源环境 第一源泉 生态标准 双重和谐 科学发展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52(2012)06-0032-09

传统生产力理论由于缺乏生态哲学理论维度,将生产力得以有效运作的生态系统前提,特别是资源环境基础仅仅作为改造甚至征服的对象,^①既没有很好地揭示对利用或改造自然的生态约束,也没有很好地规范合理利用、科学改造与自觉保护和积极建设自然的双向维度。由此,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进程遭遇来自自然资源体系和生态环境系统的严峻挑战。从马克思生态哲学维度审视,资源环境是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要素和重要条件,甚至是“第一源泉”;生态平衡是衡量生产力先进与否的客观“检验标准”之一;生态和谐有利于提升生产力达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双重和谐”。先进生产力应该而且必须遵循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文明、经济循环、社会和谐等科学发展的时代要求。

一、资源环境：生产力发展的 “第一源泉”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生产力”文

本理解,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者等构成生产力实体性的基本要素。劳动对象又分为加工物和天然物。天然物系指自然界原有的、并进入人的认识和实践范围内的自然物,而包括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等各种基本自然要素在内的各类资源环境,是其最为基本的、也是最为基础性的有机构成要素。

马克思在分析抽象劳动过程的最简单和最原始的要素时指出:“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

*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哲学基本范畴研究”(编号:11BZX029)和内蒙古大学生态哲学创新团队项目(编号:121106-22)资助。

① 关于生产力定义,国内权威辞书解释为“生产力,亦称社会生产力,是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表示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对自然界的关系。”(《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4902页);“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是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客观物质力量。”(《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784页)

是自然及其物质”，^① 这里的“自然及其物质”就包括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马克思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这句话是“在劳动具备相应的对象和资料的前提下是正确的”，并进一步指出，自然界是“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② 恩格斯也指出：“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③ 马克思认为，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是一切物质生产的首要条件——“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④ 使劳动有较大生产力的自然条件，可以说是“自然的赐予，自然的生产力”。^⑤ 正是在此意义上，资源环境不仅是生产力发展要素和基本条件，甚至是“第一源泉”。

因此，“所谓历史，从生态学的观点看，就是人与土地之间发生的相互作用的结果。换言之，即主体环境系统的自我运动的结果。决定这种运动的形式各种主要因素中，最重要的是自然的因素。”^⑥ 这些资源环境介质通过物质循环、能量转换和信息交流，使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生物圈具有动态平衡调节机制，并保持自然生态协调平衡。

也就是说，人类应该遵循生态—经济规律，建构经济社会系统与资源环境系统协调机制，才能形成运作有序而良性循环的生产力系统。因为经济指标增长和物质财富增加并不仅仅是人类生产力活动的结果，也并不只是经济再生产循环所带来的，而是从经济系统循环和生态系统循环之双重循环当中所获得的，而这也正验证资源环境是生产力发展的“第一源泉”。马斯顿·贝茨指出：“在生态学研究中，我们本不该以‘让我们假定人是不存在的’这样一句话，把人忽略掉，这对人类是不公平的。经济学家做研究时，对自然界采取了同样不公平的态度，他们说：‘让我们假定自然界是不存在的。’自然经济（economy of nature）与人类生态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任何试图将它们割裂开的努力不仅容易引起误导，而且是危险的。人类的命运

与大自然的命运息息相关，工程学式思维的傲慢自大也不能改变这种关系。人可能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动物，但他仍然是自然系统的一个部分。”^⑦

在唯物史观看来，生产力的不断变革推动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不断变革，人类社会才不断地由一种形态过渡到另一种形态。然而推动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都是直接或间接来源于自然界的资源环境。资源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与生产力发展的自然前提甚至“首要条件”。

首先，资源环境系统提供着人类社会生存与生活最基本的自然物质来源和立足空间。一方面“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不断交往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⑧ 另一方面，不仅“自然就以土地的植物性产品或动物性产品的形式或以渔业产品的形式，提供出必要的生活资料”，^⑨ 而且“撇开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98~399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页。

⑥ [日]梅棹忠夫：《文明的生态史观》，王子今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66页。

⑦ [美]赫尔曼·E.戴利等编《珍惜地球》，马杰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89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712~713页。

等等。”^① 在马克思看来，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状况既作为“生活资料的自然资源”，也作为“劳动资料的自然资源”对社会生产力的有序发展施加自然资源基础地位与生态环境前提功能之影响。马克思还着重指出：“劳动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② 也就是说，人类社会无论其科学与技术如何进步，文化与文明何等发达，也必须“靠自然界生活”。

即使是作为生产力最活跃的要素——劳动者，也首先作为“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③ 并以自然生态系统为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立足空间。诚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普遍性，在实践领域就是要把自然界的事物转化为人的生活的一部分，乃至“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④ 就是说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资料同样来源于资源环境。更何况人类也只有在此基础上，通过劳动把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能量输入生产力系统，才能把自然界的“自在之物”转换成人类所需的“为我之物”——生存资料、享受资料以及发展资料。离开资源环境就不可能有社会生产力的真实发展，也不可能有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真正进步。

其次，资源环境系统承担着生产系统以及生活系统所排放的大量废弃物的吸纳空间。环境系统还具有容纳和清除并净化这些废弃物的能力。问题在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系统为人类提供资源的能力和净化废弃物及其污染的能力并不是无限的。作为先进生产力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系统的利用应该而且必须控制在有序运作和自我恢复、有机清除和自我净化与有效承载和自我循环所允许的范围内。马克思指出：“生产排泄物，即所谓的生产废料再转化为同一个产业部门或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新的生产要素；这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这种所谓的排泄物就再回到生产从而消费（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的循环中。”^⑤

而在当下言说的“循环经济”，其基本原则为“3R”原则：减量化（Reduce）原则，即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物质和能源流量；再利用（Reuse）原则，即延长产品和服务的时间强度；资源化（Recycle）原则，即把废弃物再转化为资源以减少最终处理量。从而逐步地、然而却是有效地实现“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⑥ 否则，必然造成生态系统的破坏、环境系统的恶化和资源系统的枯竭。这样的生产力，还有先进性可言吗？

再次，资源环境系统承载着生产力系统以及经济系统得以正常有序运行的发展空间。而地球资源能源、生态空间以及环境容量的承载力是有限的。承载力概念由比利时学者皮埃尔于1938年首先提出，之后这一概念扩展到生态学、人类学、地理学等领域。国际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将其解释为生态系统在保持生产率、适应力和更新力时对健康有机体的支持能力。就其本质而言，承载物是某一地区的生态系统，其中真正起到承载作用的是资源系统。被承载物是人口，资源消耗率和废物排放率是人口数量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环境系统的主旨是要保持人口的可持续供养。不仅要维持现代人的生活，而且还不能破坏对后代人的供养能力。^⑦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8~20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5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6~927页。

⑦ 参见丁任重《西部经济发展与资源承载力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157页。

野生物基金会将其描述为：“地球或任何一个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的影响就是其承载力。人力对这种承载力可以借助于技术而增大，但往往是以减少生物多样性或生态功能作为代价的，然而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可能将其无限增大。这一极限取决于系统自身的更新或对废弃物的安全吸收。除非人口和资源需求的水平能降低到地球承载力范围以内否则人类生存持续性是不能保持的。”^① 这意味着，准确把握资源环境系统承载力，成为人类维护并推动生产力与生态系统和谐发展的必修课。胡锦涛指出：“要倍加爱护和保护自然，尊重自然规律。对自然界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利用不讲建设。发展经济要充分考虑自然的承载能力和承受能力，坚决禁止过度性放牧、掠夺性采矿、毁灭性砍伐等掠夺自然、破坏自然的做法。要研究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探索将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环境损失和环境效益纳入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②

二、生态平衡：先进生产力的“检验标准”之一

马克思以有目的的从事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来规定人。这种实践活动是人在既定的物质条件下，通过自觉能动地改造自然而实现自己目的的、现实的、感性的物质生产活动，这是主客体之间相互规定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③ 生产力的发展，实质上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历史的、感性的和现实的动态过程。人类有不断发现、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改善资源环境，使之与人类协调发展的自觉能动性。当人类遵循生态环境演化规律发展社会生产力时，资源环境就会以更多的利益回报人类，这时的生产力发展才可以说具有先进性的可能。

事实上，包括资源环境在内的大自然既是人类自身繁衍生息的原初起始点，也是我们日常生存发展的基本立足点。“自然界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

条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建设自然就是造福人类。”^④ 而在传统生产力论中人们只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看作是改造、征服和统治的对象，忽视了对它的保护、改善和建设，没有自觉注意到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和环境系统的良性循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构成要素及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这就不可避免地破坏资源环境状况，加大发展成本，付出昂贵的发展代价。

需要指出的是，以往文明形态基本集中于社会领域，与技术因素相联系主要用来指谓社会生产力水平。就是说社会生产力水平是一种文明形态的主要的、也是首要的基本特征。因此生产力系统演化的历史揭示是寻找文明时代特征的最为有效的重要线索。有必要重申，由于生态哲学思维方式的深度缺失，以往对文明成果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考量标准和评判逻辑，存在着严重的单向度价值取向和过于简单化的历史时弊——人类社会生存发展于其中，并由此须臾不能离开的自然生态环境的状况如何，不在文明和生产力评价系统之内，而几乎统统在其评价系统之外。^⑤

实际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与人类文明的进化具有极为密切的内在深层逻辑关联。对此，著名经济学家赫尔曼·E·戴利指出：“先知以赛亚说：‘肉体来自青草’。也许这是对人类生活受生态环境约束作出的最简洁的论述。但是，这样的系统思想在现代知识的日益专业化中已经被支解了。经济学家的抽象的商品世界，以及其运动和平衡的规律，与‘青草’几乎毫无关系，甚至与‘肉体’的联系也处在被割裂的危险中。这表现在经济学已经和它自己的生物物理基础相分离。”^⑥

① 世界自然保护同盟等：《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国家环境保护局外事办公室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页。

② 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4年4月5日。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1~202页。

④ 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4年4月5日。

⑤ 包庆德等：《生态文明：技术与能源维度的初步解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年第2期。

⑥ [美] 赫尔曼·E·戴利等编《珍惜地球》，马杰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1页。

其实戴利察觉到,早期的思想家呼吁人们注意这个问题。如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不列颠的经济学的“异教徒”J. A. 霍布斯注意到:“所有为了获得利益的有机世界的行为都消耗物质和能量,这是得到这些利益和服务的生物成本。尽管经济尚不能以严密的定量的方式反映幸福和痛苦,或者其他任何感觉的价值,但经济必须作为感觉价值的基础。因为,对于大多数经济活动的目的,我们一直被告知,有机世界的检验胜过其他任何福利的检验。要记住的是,这种有机世界的成本不容易或不能够充分以感觉上的痛苦或失效表现出来,而有机世界中的获得也不总能以感觉上的享受得到解释。”^①而在20世纪早期因对人口统计学的贡献而闻名的数学生物学家A. J. 洛特卡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在我们的经济现象之下是我们与其他生物共享的生物现象;并且……揭示并明确表达出其中所涉及的关系——换言之,经济学的生物物理的分析——是伴随物理生物学发展而来的一个问题。”^②很显然,霍布斯和洛特卡都看到自然基础对于经济思想,即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人类文明演进的深层关联性,乃至不可或缺性!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对物质生产资料的运用只是一种必要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这一观点有利于处理好生产力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但是,多年来人们把生产力仅定义为人们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以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还远没有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进行必要的生态约束、限制和规范,更没有对其进行生态化的有效引领。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并激化了生产力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对立冲突。导致这一被动格局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在衡量生产力先进与否的尺度上出现问题。事实上,生产力对包括科学技术及其生产工具在内的劳动资料的运用,应该说只是一种必要手段而非最终目的。而传统生产力理论对资源环境系统内在关联复杂程度的盲目低估,以及对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能力水平的盲目高估,使得人们应该是对自然的合理利用和科学改造过程,变成对人类生存发展根基——地球生态系统的疯狂掠夺和肆意破坏过程。在我看来,当代衡量生产力先进与否应至少

包括密切相关的“内在”与“外在”两种尺度:其一“内在尺度”,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劳动者素质的高低状况,取得物质生活资料和经济财富的多寡程度及其生态化走向等。其二“外在尺度”,包括自然资源的承载与供给能力是否保持坚挺强劲和利用方式科学合理,生态系统支撑与再生能力是否充满生机活力并保持动态协调平衡,环境系统容量与净化能力是否具备回旋空间,循环路径是否畅通无阻,环境系统是否具备整体化趋势等。

在当代,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与生产力正在形成一种全新的嵌套和互补关系,生态因素深刻地影响现代社会生产力的组合和运行方式。生产力发展固然与社会诸因素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然而,其形成和发展也离不开一定的资源环境因素——即使是社会分工这种社会因素也概莫能外。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源环境条件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③也就是说,没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条件的差异性和自然产品的多样性,所谓社会分工就难以形成,社会生产力也就不可能得到有序演化和有效发展。由此可见,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基础地位,特别是生态平衡标准,作为衡量生产力先进与否的“外在尺度”之标尺性功能,在当今时代越来越具有“内在化”转换的渗透功能、内聚趋势和发展态势。

毋庸讳言,科技发达程度是评价生产力先进与否的重要指标之一,但决不是唯一指标。科技在本质上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种手段,它具有双刃性。就是说它既可以发挥“第一生产力”功能,也可能导致“第一破坏力”功效!特别是“二战”以来,技术负效应日趋凸显。历史表明,在每项科技运用中一开始就蕴藏着不可预料的负效应,特别是高技术运用更是如此。科学就其本性来说是至善至美的。

① [美] 赫尔曼·E. 戴利等编《珍惜地球》,马杰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2页。

② [美] 赫尔曼·E. 戴利等编《珍惜地球》,马杰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1页。

但是科学本身不能至善，它的至善要以技术为中介。而问题是科学的技术应用，对人类可能产生好坏两种后果，即使人们抱着人类终极命运的关怀，有些“坏”也是难以预料的。^①“技术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同时也带来了风险——特别是那些未知的风险。……由于它们难于比较，我们常会权衡利弊时做得很糟。”^②因此如何自觉发挥甚至有效推动科技在合理利用和科学改造自然，以及在自觉保护和积极建设自然中“第一生产力”的正效应，而实际地规避甚至有效地避免其对于资源环境的“第一破坏力”之负效应；又如何与实践基础上不断强化人的认知能力，并不断提高技术后果评估预测水平，就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显得更为紧迫而必要。

高素质的劳动者可以说是先进生产力一个重要“硬件”，但其实践如果缺乏生态哲学维度，结果有可能出现偏颇甚至失误。布依恩·斯温指出：“我们在讲述有关价值和意义的故事时，完全局限于人类世界，宇宙和地球只不过是一个背景。海洋浩瀚，物种繁多，但这些不过是人类活动的舞台。这是我们时代最大的错误。一言以蔽之，我的立场是：我们今天所有的灾难都直接与我们忽视宇宙，将其排斥在人类活动之外的文化有关。我们对土地和技术的利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都存在着许多缺陷，尽管缺陷各有不同，但都同样的愚蠢。我们之所以陷入如此荒谬的境地，是因为我们从未置身于宇宙的现实和价值观念当中去。”^③而自觉注重与资源环境和谐发展的先进生产力，能够自觉地“意识到生物多样性的内在价值，和生物多样性及其组成部分的生态、遗传、社会、经济、科学、教育、文化、娱乐和美学价值，还意识到生物多样性对进化和保持生物圈的生命维持系统的重要性，确认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是全人类的共同关切事项”，^④这些在当代就显得弥足珍贵了。至于物质财富确实是生产力发展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但并非唯一目标，它不过是传统物质文明的表现之一。而先进生产力是要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如果物质文明成果的取得是以牺牲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其他文明为代价和成本，这样的生产力还有先进性可言吗？！因此彻底改变以往认识和改造

自然的单向度思维范式与实践方式，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而开创生产力发展和资源环境优化“双赢”的全新时代格局，可谓正当其时。

马克思把人类活动影响和作用的自然称之为“人化自然”。它有两层含义：一是人类在发展生产力过程中给自然界不同程度地打上人的实践活动烙印，从而打破自然界原有的自然生态平衡；二是人类作用于自然界的同时，又对自然界起到一定的调节或改善作用，使自然界更加适合于人类的生存发展需要。而要顺利达到后者之目的，就要求在人与自然的物质、能量交流以及转换过程中，一方面，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科学认识和合理改造自然；另一方面，人类在改造自然使之为自己服务的同时，把衡量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使生产力由向自然索取的单向活动变为人与自然界物质循环与能量转换的双向活动。可见生态平衡标准作为先进生产力的标尺性功能决不可忽略。由此，从方法论上渗透与辐射，先进生产力应该而且必须遵循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文明、经济循环、社会和谐等科学发展的时代要求。

三、生态和谐：生产力提升的“双重和谐”

从生态哲学维度审视，人类社会不仅是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双重关系的一般统一体，而且人与自然的关系，往往蕴涵着人与人的关系。而问题在于，人与人的深层利益关系，恰恰渗透着人与自然的深层协调关系。诚如胡锦涛指出：“大量事实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恶

① 包庆德：《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环境伦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年第2期。

② [美] H. W. 刘易斯：《技术与风险》，杨健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Ⅺ页。

③ [美] 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马季方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63页。

④ 中国环境报社编译《迈向21世纪》，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2页。

化,如果资源能源供应高度紧张、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矛盾尖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①时代呼唤并敦促现代生产力提升过程中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社会)之辩证关系的“双重和谐”。

因此,全面关注国家生态安全和民众生态健康,自觉注重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状况、生态代价和资源成本,注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做到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健康发展,已成为推动生产力和谐发展的重要保障。就是说在生态哲学视野中,一是应该积极寻求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与此相应的是建设自主创新型发展范式,特别是强化并提升关于科学技术的生态含量之研究;二是应该自觉探求生产力发展的质量品位,与此相应的是建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促使生产力系统与资源环境系统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发展;三是应该主动追求生产力发展的公平正义,与此相应的是创造社会成员之间发展机会平等,调控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利益分配机制,促使科学发展的成果,既要惠及全体社会成员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又要有利于资源环境系统的动态协调平衡。而后者往往又恰恰在人们的审视视野之外。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蕴涵着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和科学发展理念。如马克思指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②其核心就是实现人、自然和社会的真正和谐,也就是恩格斯所说:“我们这个世界的两大变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③这里的两个“和解”,一个是针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人类对包括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雁过拔毛、竭泽而渔、甚至杀鸡取卵式掠夺而造成的生态危机;一个是针对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现实存在着的社会不平等和资源环境不公平而导致的社会危机。马克思说:“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④如果进一步,在我看来,为了达到生产力与资源环境的和谐发展,这里应该包括三个有机构

成:其一是人与人(社会)之间的和谐,我将其概括为“人际和谐”或“人态和谐”,也就是人与人(社会)之间的人文关怀、发展方式和交往状态的和谐,它居于生产力与资源环境和谐发展的核心层面;其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我将其概括为“人地和谐”即“生态和谐”,也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能量转换和信息交换状态的和谐,它居于生产力与资源环境和谐发展的基础层面;其三是人与自身的和谐,我将其概括为“人己和谐”亦即“心态和谐”,也就是人与自身的心理状态、生理状态及其身心状态的和谐,它居于生产力与资源环境和谐发展的关键层面。如此一来,在当今时代研究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生态和谐与生产力和谐发展的关系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首先,生产力与生态和谐的关系是贯穿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始终的重大问题。就人的生物属性和自然存在而言,“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⑤“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⑥换言之,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自然界内部的关系。在此意义上人和其他生命体一样,也参与生态系统的物质循

①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6月27日。

②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0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4~375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页。

环、能量转换和信息交流。因此自然对人来说不只具有工具价值，而且还具有生态价值。就此而言，人类也不应仅以一己短期局部之私利，而一味强取豪夺而不顾及后果。

即使是就人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存在而言，在前提和终极意义上，也是不可能绝对超越自然界的。历史和现实表明，相对于满足人们包括物质、精神和生态等各方面需要而言，自然价值是有限的。也正是因为这种有限性，对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应该而且必须遵循其再生时间过程、再生空间范围、再生数量规模和再生质量效果。而对非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至少应考虑其在目前技术条件和制度安排下怎样开发利用才能使总的效益最佳化，付出的环境资源成本和代价最低化，以及寻找替代资源的速度如何才能高于或至少不低于开发利用的速度。因此，先进生产力的科学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维护并增进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和谐的过程，而包括人与自然和谐在内的生态和谐的过程，乃是生产力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过程。

其次，生产力与生态和谐的关系蕴涵着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问题的丰富底蕴。先进生产力与生态和谐的关系有助于加深认识生态主体与生态客体及其本质规律，加强对生态价值与生态伦理以及生态思维方式和生态实践方式的研究，澄清人们对生态价值等一系列生态哲学范畴和实际问题的模糊认识。而生态和谐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状况如何，取决于人是否高扬科学发展理念，以及人的生态存在和生态意识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的状况。这是因为，要使资源环境适应人，为人的生存发展提供雄厚的自然资源基础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条件，必然要求保障资源环境的持续发展、遵循自然生态环境的演化规律，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环境系统平衡协调机制。换言之，建设和谐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就等于建设人的生存发展的自然基础，也就等于建构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前提，从而有利于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价值诉求；相反地，破坏井然有序的自然生态环境，就等于破坏人的生存发展的环境条件，

也就等于消解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基础，从而背离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利益追求。一句话，自觉地强化先进生产力与生态和谐及其关系的系统研究，将全面揭示和有效规范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现实基础以及和谐有序的生态前提，促使人类真正走向生态文明与和谐发展之路。

再次，生产力与生态和谐的关系影响着人们对生存与发展诸问题的不同理解。比如，传统发展观在自然资源与能源利用方式上，往往是竭泽而渔、竭草而牧、竭地而耕甚至是杀鸡取卵等掠夺式的；在经济增长方式上是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甚至是不计成本等粗放型的；包括对科技的理解主要局限在对自然的疯狂掠夺和盲目征服上。而生产力和资源环境的和谐发展的时代要求，促使发展观和科技观等一系列观念范式的生态化转换。生态哲学视野中的科技便是绿色科技。当代绿色科技正是在伴随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不断加大过程中凸显出来的，其实质是一种可保持人类持续发展的科技体系，是当今时代对科技为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服务的方向性引导和生态化规范，它要求一切有害生态环境的生产技术将受到严格限制直至淘汰出局，而无害生态环境的生产技术将得到高度重视直至推广普及，从而加速人类与其生存环境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进程。因此，在生态哲学视野中，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和资源环境和谐发展的有效手段和中介系统，应该既可以为合理利用和科学改造自然效力，比如为当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所采取的循环实施循环经济、节能降耗减排等生态化实践方式的有效运作及纵深拓展发挥重要功能；同时还可以为自觉保护自然和积极建设自然服务，如为自然生态力的解放而采取的治理环境污染、防范生态失衡等绿色化行为规范的有序生成及其发展壮大提供有力杠杆。因此，生态哲学视野中的发展在其本质上乃是和谐发展！对此，胡锦涛指出：“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努力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要在资源开采、加工、运输、消费等环节建立全过程和全面节约的管理制度，逐步形成

有利于节约资源的产业结构和消费方式,构建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社会。”^①

由此,在我看来,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手段,为恢复与治理已遭破坏的生态环境和预防生态失衡提供有力的杠杆。尤其是先进生产力系统中具有较强生态意识和生态素质的劳动者,通过有效地调控科学技术交流的中介系统来有效影响生态系统,以实现生产力系统和再生产过程的科学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必然强调改变生态系统内在结构和功能,使之成为再生产的目的服务。劳动者在对生态系统结构施加影响时,生态系统并非完全被动接受这种影响,它会在内部调节机制的作用下,对这种影响做出反映并反馈给生产力系统。先进生产力系统在接收到生态系统反馈信息后,必然能及时调整对生态系统改造和施加影响的内容和程度,并保持某种限度内促使先进生产力与生态系统向良性循环的方向科学发展,也就是和谐发展。

即使是对“生态伦理”的理解,也应该而且必须给予生态哲学维度以全新解读!之所以强调资源系统的破坏、环境系统的污染和生态系统的失衡是不道德的,因而应当而且必须受到应有的

谴责甚至必要的惩罚,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这些行为损害了人类整体和长远的利益。正因为一些人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直接或间接损害到另一些人的利益,因此这种人与自然关系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与人关系的有机构成,从而具有了伦理意义。^②换言之,做出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道德选择,是以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演化规律的认识为前提,基于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对于人类生产力和谐发展的价值所做的明智选择。

本文作者: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内蒙古大学生态哲学创新团队学科带头人,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责任编辑:周勤勤

① 胡锦涛:《把科学发展观贯彻于发展的整个过程》,《求是》2005年第1期。

② 包庆德:《生态伦理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新华文摘》2005年第14期。

The Ecological Dimension of Marxist Productive Forces Theory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Bao Qingde

Abstract: For short of eco-philosophy dimension and merely transform and conquer natural resources,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could not make productive forces operate efficiently. There fore,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suffer severe challenges from both natural resource system and environmental system. The related literatures indicate that Marx has important thoughts of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environment. Surveying form Marxist eco-philosophy dimension, resource environment is the basic element and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so far as to the primary source. Ecological equilibrium is one of the examining standards of measuring whether productive forces are advanced or not. Ecological harmony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productive forces to achieve the dual harmony of “human and nature” as well as “people and society”. The advanced productive forces should and must follow the era requirements of resource conservation, friendly environmen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ircular economy and social harmony.

Key words: productive forces; resource environment; primary source; ecological standard; dual harmony; scientific development